

爱与孤独的合奏

——浅谈近年老年题材中的爱情书写

□ 张语婷

斗转星移,仿若转瞬之间,人就到了暮年。那些随风飘散的思绪里,有追忆逝去的惘然,也有对坚定执着的守望。在近些年关于老年题材的书写方面,作家们从日常生活的波澜里划桨开去,穿过时间的河流,将这些情感一一道尽。而谈及爱情这个亘古如斯的母题,很少会将其与老年人联系起来。在大多数人眼里,老年群体意味着一个普遍的刻板形象。走过雨露风霜,退却了轰轰烈烈,他们的爱似乎也凝固起来。新时期伊始,张洁的那篇著名小说《爱,是不能忘记的》,在重新复苏人道主义的同时,也刻画了一个老人和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,她以日记的形式,始终倾诉着她逝去的爱情。直至她生命的最后一程,爱,都是不能忘记的。最近发表的袁山山的《绿挎包》,黄咏梅的《昙花现》也从不同角度书写了这样隐匿一生的情感:哀伤、忧郁、念念不忘。袁山山在之前一篇创作谈里曾说:“在人们的感觉里,爱情好像是年轻人的事,年轻人怎么去爱,怎么爱得疯狂都是应该的。其实爱情关乎人性,是人性的一部分。所以一个人只要活着,爱情就有可能发生。”因此,她还写下了短篇小说《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》。此外,还有近期艾玛的《房间里的伏尔泰椅》、马平的《猛追湾》、杨知寒的《三手夏利》等作品,都关注老年人的晚境,书写他们的爱与孤独,彷徨与前行。

《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》(《人民文学》2018年第5期)主人公曹德万是一个八十四岁的老头儿,住在养老院里,然而他不顾养老院同伴的嘲笑和儿女们的反对,每天都要出门去找爱情。近五年间,曹德万每天天不亮就出门,天擦黑时再回来。年龄的衰老在曹德万看来,根本不算阻碍。比如,他在河边救小孩后,别人送来的锦旗上写着:“老英雄见义勇为”。他不满地说:“干吗要加个老?英雄见义勇为为就可以了嘛。”在大家的眼里,曹德万就是一个“活宝”。养老院的人总是当喜剧小品来摆他的龙门阵。曹德万也乐意分享自己的故事。而在这诙谐幽默的背后,更有另一层苦楚的含义。老伴去世后,他忽然不知道日子怎么过了。他说,“我也想要个伴儿,所以我去养老院不是去等死,是想重新找个伴儿,重新成个家。”他不将就,并不是随便就找一个人。按他自己的话来说,他要找爱情,按着他心里爱情的模样去寻找。而这个人还真让他找到了。为此,他每天赶第一班车进城,陪她说话,让她高兴,还学着写情书。这是一个笑中带泪的故事,我们一边觉得曹德万这个老头儿的可爱,一边也能察觉到他藏在深处的孤独。

袁山山在近作《绿挎包》(《芙蓉》2024年第6期)中所塑造的老人形象虽与曹德万迥然不同,但他也在找寻

一份丢失的爱情,只不过他是沉默的、隐忍的。《绿挎包》中,公公与婆婆生活了一辈子,而他心里却一直念着另外一个人。下姑娘是他的初恋,因为历史的阴差阳错,他们没有能够在一起。出于对家庭的责任,他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抛弃妻子和逾界。一直到婆婆去世,公公托“我”去寻人,才揭开了关于他微信头像“绿挎包”的尘封往事。这确是一段让人叹息的纯真爱情,但何尝不是一段更为唏嘘的婚姻生活呢。对于那个只能用骂与指责来排解一生的妻子来说,无疑不也是一种伤害。袁山山没有去苛责这一段感情关系,正如小说中作为儿媳的“我”,也屡屡因这段非正常的情感关系牵连遭受委屈,但最后也没有将这个残忍的真相告知,下姑娘因他发疯已早早地死去。袁山山对她笔下的人物似乎永远都保有一种包容与温情。

与《绿挎包》有相同主旨的还有黄咏梅的《昙花现》(《钟山》2023年第1期)。这也是一个因命运错失而眷念一生的故事。《昙花现》中,主人公林姨妈的一生,就像她亲手栽下的昙花,那一时的绚烂仅仅为了那一个人。她曾经是样板戏里的主角,而他是当地地委书记的贴身警卫员。本是一对才子佳人,也因特殊年代造化弄人,相爱的人终究没有在一起。五十多年过去了,她老了,就像她过早放弃了生活一样,她也放弃了对于身体病症的治疗。她的一生,念念不忘地是那个名叫“钟俊人”的人。林姨妈去世后,母亲托“我”去寻找,“我”最后见到的钟俊人,已是一个长满了老年斑的失忆老人。每个人都年轻过,也将垂垂老去。正如黄咏梅在小说中写到,大多数人的一生就是“按着时间给出的剧本,各自演着人生这出大戏,结婚生子,工作至退休,继而含饴弄孙。”在一种按图索骥的社会规约里,我们向往青春,描绘青春,又比起当下对于中年情感危机与人生困境的书写,老年人的晚景及情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漠视的。也许他们更害怕孤独,尤其是对于那些丧偶的老人,或独自生活的老人们

艾玛的短篇小说《房间里的伏尔泰椅》(《当代》2024年第5期)也正写出了这一深切的情感。作者别具一格地运用意识流的手法,在一种回望式的叙述中,深情地抒写了一个老人的孤独与无所适从。妻子去世后,留下一个孤身老人,在一间房里,而他又不断地梦见另一间白色房间。梦境里那把伏尔泰椅此刻成为他感情的一个寄托与象征。艾玛以无比细腻的描述,意味深长地描绘着关于这把椅子的细枝末节。这一种看似避重就轻的书写,却有四两拨千斤的力量。梦境与真实已难以分辨,只有缓缓流淌出来的情感可以捕捉。她把这种飘渺的孤独具象化了,他的情感又投射到一

张曾经的双人床上。“我们在这张床上爱,在这张床上笑,也在这张床上哭……自我妻子死后,我就不曾在这张床上睡过觉了。我总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这张床对我来说太大了。”整篇小说充满了忧伤的情感基调,在片断化往事的回忆中,往昔的爱恋不断缠绵浮现,而现在弥漫于房间的落寞光景令人无限感怀。

马平的短篇新作《猛追湾》(《人民文学》2024年第11期)写一个老太太,在过去两年间,每月都要来一间茶舍,为瘫痪在床的老伴买两次茶。茶舍店主万璐称呼她为“沈老师”,但万璐对于沈老师的家庭情况一无所知。一个下雪天,沈老师又来了,然而她告诉万璐,以后她不会再来了。“他是拉着我的手走的……他把我擱在了半路上……我们相好的时候,我二十七岁……”老人只轻言细语地断断续续道出了这几句话。万璐才得知,沈老师与老伴是二婚,他的老伴与前妻还有一个儿子。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,将两代人的三段感情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。沈老师的深情,宛如一面明镜,悄然牵引着年轻一代的选择。万璐到最后也才得知一个真相,沈老师的老伴喜欢喝茶,但最后两年,只能靠着鼻饲维持生命。沈老师坚持每天都要沏一杯茶。马平擅长在自己悠缓的叙事节奏中,从容地开启一段情感叙事,娓娓道来,不经意间,去触动人心那片柔软的地方。

此外,还有90后作家杨知寒的《三手夏利》(《草原》2023年第1期),也是一篇关于老年人寻找伴侣与爱情的故事。男女主人公因一档电视相亲节目认识,女主人公吴天华性格外向开朗,男主人公卜文彬老实内敛,看上去原本不搭边儿的两人,渐渐达成了一种心灵上的相契。卜文彬的儿子送给吴天华一辆三手夏利车,希望能教父亲开车的同时,带父亲散散心。吴天华发动的那一刻,昔日的风华正茂仿佛又回来了。她“每天期待的就是开车,在市里泥泞的街道上,她和卜文彬以无人知晓的雄心壮志,超越每个每辆无论车还是驾驶员都年轻多的路上的对手。”两个人成为彼此晚年的好朋友,而一段黄昏恋还未来得及开始,让人意外的是,卜文彬猝然离世。他生命的最后一程,留给了吴天华两句话——“早认识你就好了。现在认识也不晚。”有一些感情不动声色,也依然令人动容。老年的爱情,从来不是没有,兴许是藏得深沉。

艾玛在《房间里的伏尔泰椅》中写下,“人类的秘密书写源于什么也无法阻挡的爱情。”作为一种生命体验,它贯穿于人的一生。通过文学书写,作家将被时光夺去的记忆与爱情,又重新交还给了他们。也许时间只是让他们的容颜变老了,但他们心底的爱并没有消逝。当我们在对老年化问题作出思考和感悟时,那些被搁置的浪漫与诗意,值得被打捞。

认识何定镛老先生已有五个年头。我们之间的交集缘于都定居在温江,也得益于我们对温江这个“上风上水”之地都情有独钟;更缘于我们在一个民间群体“花间集”里以文会友。老先生在温江居住的时间比我早,但在老温江的眼里都属于新温江;更重要的交集,我们都是“报人”,都从业于新闻。

从业务的角度,我和何老都以记者的名义,在“上至英雄好汉和下至讨口要饭”间“自由地穿梭”,因此一谈到职业经历,不用三句话我们就能迅速融入彼此,迅速找到谈话的“切口”,那会意的点头或微笑或开怀大笑,都能从记者的过往经历中交心彼此的共同感知。

就如何开四在续篇所言,“何定镛先生是个资深的新闻工作者,也是位知名作家。我觉得他作为副总编发行的报纸《成都商报》,亦得是出色的。定镛在《成都商报》供职多年,也许是因为职业习惯吧,定镛的作品很‘杂’,散文、随笔、小说、纪实文学、报告文学以及科学文艺等体裁他都在写,而且同他的编辑工作一样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定镛的作品真切、自然,很容易和读者产生沟通。”

不错,何开四先生一语中的,何老的“杂”成为他文章“短小、精悍、广博”的特色,试想,一位西南久负盛名的《成都商报》的副总编辑,每天要处理“海量”的信息,在报纸的“大样”过审后,能在脑袋里清空所有的当日的新闻发稿,然后面对电脑去写大部头长篇,可能吗?即便是当时在《明报》办刊的金庸先生也做不到,他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《天龙八部》《鹿鼎记》等巨著都是若干年累积而成的。

这让我想起成都老报人车辐,他和何定镛老先生就有大同小异的经历,车老的《川菜杂谈》,让他自称“饮食菩萨”,能在成都这个“美食之都”称自己是“饮食菩萨”,要有点“名堂”,一翻开车老的书,开篇就是与张学良、张大千、李劫人、巴金、艾芜、李济生、流沙河等一众名人共进晚餐,可想而知,名报人的格局和场面。不过车老要比何老长三十岁,但何老的散文、杂文、随笔一点也不逊于车老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这评价不为过,正如吴显奎老师在序中说:定镛这部作品选似得杜甫老先生的神力,全书也体现出“变”字,即时代之变、社会之变、审美之变。这是一部记录成都社会变革的百科全书式作品集。一个“变”字通古今。定镛这部“文选”,无论是散文随笔、小说篇章、纪实文学,还是科学文艺、评论文章、评论报道,都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化、一个社会的变化和一个人的变

化在他的身上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历史、一个时代的变化,并把这段历史、变化通过不同的体裁记录下来,这是最宝贵的。因此,这部书值得一读。

毫无疑问,在何老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里,“变”构成了他文章的“主干”。随着“主干”,枝杈交错,枝叶茂盛。读者能顺着这条以时间为轴的延长线,看见何老文笔的精湛、智慧的延伸,这个文集就说明了一切,在此,我毋庸赘述。

这也是我向何老学习的切入点。对,我们都住在温江,都想为新故乡尽一份文字的呈现。

因为,外界常常问了一个问题,也可能是所有温江人都会面临的问题,温江在农耕文明之初就获得了以“金”来冠名,“金温江银郫县”并非浪得虚名,这成片的万亩良田,在稻子成熟时,金黄一次,在麦子成熟时又金黄一次,在油菜花黄时再黄一次,油米之乡早已成为川西坝子最为殷实的地方。

然而,在进入现代社会的当下,显然传统农耕文明的温江,已经满足不了现代人对传统金温江的定义,如今的新规划这样定位温江,“城乡融合功能区和医药产业、现代农业示范区”,这也给包括何老的温江文人给了一个课题,如何理解和重新定义新温江,让这个城乡融合之地在教育、科技、医疗、健康、养老、银发经济、现代农业更上新台阶,包括以医疗为基础的生理康养到艺术康养,提出了新要求。

毫无疑问,在上风上水之地提出艺术康养,就要求文艺工作者有了新的思考和布局。

这一点,笔耕不辍的何老有两篇读评让我动容。

一篇是《听政协老甄讲课——政协老甄先贤素描》,何老写道: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,各种矛盾汇聚,用教化、沟通、说教、布道的方式去化解各种矛盾和困惑,演讲精神文明意义重大,政协老甄执着于此。甄先尧于2006年年底到政协,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“政协老甄”。6年时间,政协老甄经常应邀到四川各地去演讲,内容涉及时事政治、传统文化、形象策划、创新思维等。不尽长江滚滚来,他的思想来自读书——一有了感悟,就要与人分享。老甄讲,一部人类文明史,就是一部阅读史。

另一篇是《润物细无声,一述说‘李永康现象’》,何老写道:近些年,中国小说界,四川、成都文学圈都有人在议论一个令人炫目的小小说现象,即“李永康现象”。在中国小小说界,李永康是个两栖作家,一手写小小说,一手写评论,还是四川、成都小小说界的领军人物。他的作品《红樱桃》《生命是美丽



的》入选中小学教材,滋润千千万万中小学生学习健康成长,多篇作品成为初中、高中语文试题,大学教学材料,促进了千千万万大中学生成才。而李永康其人却极其低调,对社会百态有一定的洞察力,其创作力远远在一般小说家之上。而他仅仅是一个区级文化馆的普通文学辅导员、编辑,在社会最基层的文化岗位上无私奉献18年之久,这与一个作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是完全不对称的,形成了强烈反差,这也是我关注的“李永康现象”之一。

何定镛老师同我茶聊时说:两篇读评,政协老甄是中国农家乐之父,李永康则是中国著名小小说作家,两人名声都在外,他们一帮温江文人构成了金温江的文化底色,可能有人要质疑,鱼凫和王光祈才是温江文化的底色。没错,如果传统没有传承,现代没有光大,构不成温江,特别是金温江的过去、现代和未来。

金温江,文化不能等闲,何老在书的后记写道:人生只有三天,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。

人生如四季,春、夏、秋、冬。笔者年届八十,进入了人生的冬季。在这八十个春、夏、秋、冬漫长的人生苦旅中,演绎着人生追求的执着与拼搏,生命阅历中的无数尴尬和阵阵伤痛,成就了磨砺个人成长的基石。

《岁月融融——何定镛作品选》的“卷首语”、24篇“散文随笔”、4篇“小说篇章”、10篇“科学文艺”、4篇“诗歌咏叹”、5篇“纪实文学”、8篇“评论文章”、11篇“评价报道”、“何定镛年谱”和“后记”,宣传、记录了他含笔抚豪铺写的金色之路、勤劳之路。

路上

——读塔双江的散文集《行走》

□ 牛放

若论文学创作,我必须称塔双江一声“先生”,我们同在四川阿坝州生活,他在《阿坝日报》和《草地》发表文学作品时,我还在若尔盖的乡村学校里教孩子们读书,而这时距塔双江发表作品已经好几年了。若论年龄,我俩是同年出生,他比我小几个月,是弟弟。若论姓氏,他本名刘华章,我本名贾志刚,实际上我的父亲是刘兴武的儿子,后来父亲与他哥哥刘树江在江油中坝走散,流落平武后被贾天恩收为义子而改名贾廷义,如此说来其实我是刘氏血统。如是,我与塔双江又有了同姓的关系。说到底,我与塔双江更多的还是兄弟情谊,文友关系,也就对他的人生更熟悉一些。

双江的人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,他始终生活在底层,经历着普通人的艰辛和荣辱,而永远不离开不弃伴随他一路行走的是文学,他的经历毫无疑问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源泉。

他出生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

州汶川县漩口镇,从小就过着苦难的生活。17岁那年,他在水泥车间当工人,进的厂是生产建筑材料的汶川县方解石厂,后来他换了单位,从县属企业调到州属企业。结果,还是水泥厂。个中的酸甜苦辣可想而知。后来他从国营企业职工变成了合同制工人,再后来他应聘到报社当记者、当编辑,后来又又在九寨沟中学做校刊主编,之后他就如同他童年时在岷江里捡水柴时的水柴一样,在时代里漂泊着,命运始终不济,他工作是养家糊口,写作是思考,是倾诉,是疗伤。

漩口,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与水有关,而且水很凶猛,是漩涡之水,过了漩口就是世界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。寿江与岷江在这里交汇,两条江交汇处耸立着一座塔,名曰回澜塔。回澜塔为九级密檐式砖塔,由下向上逐级内收,塔身呈六边形,以白色灰浆抹面,塔高21米。在我给塔双江这本散文集写序时,他告诉我,他的母亲是小金县的藏族,因为父亲

的原因,至今他的身份证上依然写的是汉族。为此,他舅舅给他取了一个藏族名字,也就是他现在的笔名。塔双江这个笔名很有深意,一是因为信仰白塔,也为追求正气,气正则邪避;二是“双”为吉祥,也是故乡的标志,寄托乡愁;三是江为岷江水,暗示在人生的道路上永不回头、奋勇向前,但必须有担当有责任。是的,塔巍峨不动以定风波,双江却是奔流不息,直入大海,塔双江注定是以水的方式活着,而以塔的作用为追求,这也注定了他的人生在路上。幸好他是一位作家,一生行走并非坏事,行万里路,如同读万卷书,虽然活得苦点,但何其幸也!

双江生活虽苦,我却从未见过他的苦相,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,心情是愉悦的,总是一副乐呵呵的笑容。在他的作品中,也总是把十分悲苦的事情轻描淡写地表述出来,而其深刻的叙事和深度思考则蕴含其中,更具杀伤力。如在《永生难忘的恩情》一文中,作者写道:“那时,父亲白天扫大街,晚上被批斗。每天天还没亮,父亲就偷偷地利用扫大街的空隙,爬上岷江河边的犀角岩山捡柴卖来维持生活。再后来,父亲觉得靠这微薄的收入仍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干脆将每月供应的鲜肉、清油、黄豆等副食品票证卖掉,可家里揭不开锅的事仍经常发生……那天,父亲抗美援朝

时期的一位战友路过漩口,顺便来看望他。他们聊到中午,还不见父亲煮饭。于是,他走到我家灶台前揭开饭锅,发现锅里面空荡荡的,什么也没有;再掀开米柜,米柜一粒米也没有。他什么都明白了。从上衣口袋里掏出10元钱默默地放在父亲手中。要知道那个时候的10元钱相当于一个国营企业正式职工半个月的工资,差不多能买100公斤大米啊!”这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没有战死的两个生死之交的战友的友情。作家双江是位诗人,他有能力包装语言,但他没有使用任何华丽的语言,他用素描的方式进行叙事,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冲击着每一位读者。

关于漩口,作家留下了不少笔墨:《捡水柴》《漩口街市》《晚钟声中的漩口古镇》《远逝的童谣》等,而今,回澜塔作为文物已经搬迁,漩口古镇已被紫坪铺水库淹没在水底。昨天已经成为历史,作品不是依靠回忆创作的,而是在鲜活的现实中完成的。

作家塔双江离开了漩口,他不得不背井离乡,有故乡被淹没的原因,有为了求生存寻找新的职业的原因,

当然也有后来企业破产的原因,不管什么原因,作家塔双江都必须离开故乡踏上新的行程,因为他的人生就是在路上,他的人生就是行走的人生。之后他去了马尔康、九寨沟、成都,还有北京、贵州、云南、广东、陕北、鄂尔多斯,有的地方居住时间长,有的地方生活时间短,但都是在底层,都是与普通人在一起,自己也是普通人,艰难而快乐地生活着、书写着,而故事却不是普通的故事……

双江很像草原上的牧民,逐水草而居,日出而牧,日落而息,然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写作,没有停止和懈怠对文学的敬畏与追求。对于文学,他一直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,保持着旺盛充沛的精力。他虽然再也回不到自己的故乡,但一直行走在路上,他对于生活的热爱丝毫未减,在他的身后留下了“走南闯北”“畅游川西”“行走点滴”“一孔之见”等篇章,其中不乏耐读的佳构力作,这里就不赘言了,读者都是明眼人。